

关于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问题的研究

刘光杰 彭必源

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在低水平徘徊中趋于下降。我国经济效益的下降是全面的、损失是严重的,影响是深刻的。经济效益下降既有表层原因,即直接导致成本上升、物耗增加和利税下降的现实因素,也有因经济发展速度处理不当、导致产业结构失衡以及经济体制不完善等深层次的原因。要提高经济效益,应针对造成经济效益下降的不同层次的原因,采取不同的对策。

本文将对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现状、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止经济效益下降,提高经济效益的初步设想。出于研究的方便和分析问题的需要,第一,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只是根据分析问题的需要涉及到其他类型的企业;第二,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以建国以来的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为背景,但由于受国家发布统计资料的时间上的限制,本文的资料对比分析主要集中在1985年—1988年之间,而对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的考察,将根据问题的性质,相应向前后延伸。重点是分析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

一、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现状

据现有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在低水平徘徊中趋于下降。

1. 以利税为主体的投入产出经济效益指标持续下降

(1) 资金利税率,成本利税率和销售收入利税率趋于下降,产值利税率在低水平徘徊中趋于下降。

1985年—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除1988年比上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外,其余各年分别比上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3.1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但1988年比1985年下降了3.2个百分点。这四年中水平最低的1987年,其资金利税率仅比建国以来的1961年、1962年和1976年高,低于所有其它年份,比经济正常发展的1956年和1965年,分别低11.8个百分点和15.6个百分点。成本利税率和销售收入利税率一直趋于下降,1988年同1985年相比,分别下降了8.6个百分点和5.52个百分点。产值利税率虽然有所波动,但总体水平是下降的。1988年与1965年相比,下降了6.6个百分点,1988年与1978年相比下降了0.4个百分点。

(2)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在波动中趋向下降。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1984年为22.3元;1985年为22.4元;1986年为19.9元;1987年为19.7元;1988年为20.2元。1986和1987年趋于下降,虽然1985年和1988年分别比上年增长0.1元和

0.5元，但1985年同1957年和1965年相比，分别下降了11.79元和7.33元。

(3) 每百元工业产值占用定额流动资金不断增加。1985年—1988年，每百元产值占用定额流动资金分别为28.7元，32.5元，33.1元，34.3元。1988年比1985年增加了5.6元，增长了19.5%。1988年除了低于1961年，1962年和文革时期的水平外，均高于其余的所有年份。

(4) 可比产品成本不断上升。1985年—1988年是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上升最快的时期。1985年上升了7.7%，1986年上升了7.3%，1987年上升了7%，1988年上升了15.6%。1988年比建国以来可比产品成本上升年份最高的1961年上升的13.9%还要高出1.7个百分点。

(5) 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净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我国工业部门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1984年为67%，1985年为67.4%，1986年为68%，1987年为69.1%，1988年为70.2%，其物耗水平逐年上升。1988年比1984年上升了3.2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净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88年同1957年和1965年相比，净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分别降低了6.7个百分点和6.2个百分点。

(6) 亏损额不断增加，亏损面不断扩大。1985年—1988年，全国工业企业亏损总额和亏损率，即亏损额占实现利润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全国工业企业的基本趋势相同。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亏损总额占全国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比重，1984年为77.8%，1985年为80%，1986年为75.3%，1987年为72.07%，1988年为76.8%。亏损面也是不断上升的。全国工业企业的亏损面1984年为10.72%，1985年为10.85%，1986年为13.16%，1987年为14.36%，1987年比1984年增长了3.64个百分点。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亏损面，1984年为10.20%，1985年为9.66%，1986年为13.07%，1987年为13%，1987年比1984年增长了2.8个百分点。

2. 经济效益下降的严重性。

(1) 我国经济效益的下降是全面的。一是几乎所有的以利税为主体的投入产出指标都是下降的，并且都低于经济正常发展年景的最好水平，尽管有个别指标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波动，有时有所上升，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二是经济效益下降的范围广、幅度大。1988年同1985年相比，资金利税率下降的有18个省、市、自治区，占62%，下降幅度在4个百分点以上的有9个省、市、自治区。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上海、天津、山东等省区。其中上海和天津，下降幅度分别为26.37个百分点和9.9个百分点。

(2) 经济效益下降的损失是严重的。

首先，从亏损率来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上升了4.79个百分点，多增加亏损42.76亿元，1987年比1985年上升了3.37个百分点，多增加亏损26.48亿元，1986年与1985年相比，上升了3.5个百分点，多增加亏损30.34亿元，1985年—1988年因亏损率上升共减少利润99.58亿元。

其二、从资金利税率来看。1988年比1985年下降了3.2个百分点，减少利税约255.5亿元，1987年比1985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减少利税约260.76亿元，1986年比1985年下降了3.1个百分点，减少利税约202.41亿元，1985年—1988年因资金利税率下降共损失利税约718.67亿元，若资金利税率保持1985年的23.8%的水平，1988年提供1774.9亿元的利税，只需资金7457.56亿元，可节约资金1145.8亿元。

其三、从全社会工业企业净产值占总产值的平均比重来看。1986—1988年同1985年相比，分别下降了0.57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和2.74个百分点，分别损失国民收入约63.8亿元，

234.82亿元和499.36亿元，共减少国民收入约797.98亿元。

(3) 经济效益下降的影响是深刻的。

我国的工业企业在产值增长的情况下，利税总额仍在增长，但赶不上产值的增长和投入的增长，这表明我国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的增长，主要是靠增加投入所带来的，而反映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比率的经济效益指标却在下降。这种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

第一，导致企业缺乏活力。首先是导致企业竞争能力下降。产品成本是价格竞争的基础。产品成本越低其竞争力就越强，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物质消耗增加，成本上升，其产品的竞争能力必然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的竞争能力下降；其次是导致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下降，在资金不足生产要素有限的情况下，经济效益下降、各种消耗上升，成本提高，企业的留利水平下降，从而使企业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不断削弱，导致企业缺乏发展的后劲。最后是导致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应变能力下降。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不仅不能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相反，要获取同样多的剩余产品，还必须不断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企业资金有限和生产要素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使企业技术开发的能力减弱，导致企业应变能力下降。所以，企业经济效益下降是造成企业缺乏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妨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提高，生产要素占用量增加；一是使获得相同数量的产品，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耗费和占用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从而相应减少了剩余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在总量上削弱了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二是在剩余产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要获得相同的社会总产品的增长，就必须将更多的剩余产品转化为积累，从而相应降低了消费基金在剩余产品中的比重，使消费基金的增长难以适应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从而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第三、削弱了国家的宏观综合调控能力，以利税为主体的财政收入，是国家协调经济、科学文化和国防等事业以及应付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物质基础。企业经济效益越高，向国家提供的利税就越多，国家的宏观综合调控能力就愈强，而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一方面在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向国家提供的利税就越来越少，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必然导致国家宏观综合调控能力下降。另一方面，要保证利税不断增长，国家就必须向企业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相对减少用于发展科学文化和国防事业等方面的开支，降低国家的社会后备基金的水平，从而也导致国家的宏观综合调控能力下降。

第四、妨碍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效益下降，投入高，消耗高，产出低、越来越多的投入，只能带来不断减少的产出，在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金缺乏，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要在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必然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和资源缺口，而难以实现。在经济效益下降的情况下，不仅国民生产总值的翻两番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也是靠增加劳动耗费和投入来实现的，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多大的实际的好处，也不能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可见，经济效益的下降必然妨碍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五、妨碍改革的进一步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要使各种利益关系得以顺利调整和减少不同利益之间的摩擦。只能在各种利益的增长过程中进行相应的调整。为此，就必须要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提高经济效益则是提供这种保证的唯一途径，经济效益的下降，必将使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调整的范围日益狭小，难度加大，从而延缓改革进程。

因此，无论是从经济生活的实际来看，还是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益的下降都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

二、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

造成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根据其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可分为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

1、造成经济效益下降的表层原因

所谓表层原因，就是导致成本上升，物耗增加和利税下降的现实因素，其表现如下：原材料、燃料等价格上涨，使企业成本急剧上升；原材料、电力等供应不足，常常导致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产出减少，经济效益下降；设备老化、技术水平低，生产产品的物耗能耗高，成本难以下降，导致经济效益低下；企业素质差，综合管理水平低，企业内“跑、冒、滴、漏”严重，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造成浪费，从而导致成本上升；劳动纪律不严，工艺纪律不严，产品废品率上升；决策失误，造成投资效益不能正常发挥，使工厂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社会负担加重，滥摊派，乱收费有增无减，造成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大量增加，利税减少，经济效益下降；劳动力素质劣化，大量主要劳动岗位被非熟练劳动力占领，生产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水平上升，造成经济效益下降；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工资侵蚀利润，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向个人消费基金倾斜，使利税的比例下降，从而降低了以利税为主体的投入产出比率的经济效益。还有，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过高以及某些人占有大量非法收入的严重分配不公现象，造成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下降，以及银行贷款利率提高，企业利息负担加重，等等。由于各个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因素的不同，以上各种因素影响经济效益的程度也会各不相同。

2、造成经济效益下降的深层原因

以上影响经济效益的直接的表层原因，只不过是经济发展速度处理不当，引起产业结构失衡和经济体制不完善这一深层原因的表现。

(1) 关于经济发展速度处理失当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速度与效益是有区别的。尽管较好的经济效益的获得要以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为前提，但并非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经济效益就越好，速度只是影响经济效益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因素，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是有条件的。^①

速度与效益关系的现实表明：二者并非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从利税总额来看，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与利税总额的增长保持相同的趋势，并显示出较高的相关性，但从投入产出比率的经济效益指标看，就不同了。1988年与1985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64.25%，利税总额增长了33.04%，而资金投入增加了53.51%，劳动力投入增加了10.85%，平均物耗上升了2.8个百分点，增长了4.15%，资金利税率下降了13.45%。这表明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一定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而利税总额的增长与产值的增长的一致性。在物耗水平上升和资金利税率下降的情况下，说明利税总额的增长主要是靠增加投入来获得的。

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不能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而且还会破坏提高经济效益的条件，导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失衡，并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失衡造成经济效益的下降。

第一、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与经济效益下降。追求以产值为核心的高速发展，必须增加投资，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提高积累率，降低消费基金的比例来实现，这

样就必然破坏积累与消费基金的合理比例,造成经济效益下降。一是因为消费基金比例下降,从而降低了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甚至降低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导致经济效益下降。二是因为积累对消费的挤占,还会受到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在使用上相互替代困难的限制。与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相对应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在物质构成上是不同的,是根据满足不同的需要而生产的,二者在使用上大多数都不能相互替代。即便有某些产品能够相互替代,也会因性质、规格不完全符合扩大再生产对生产资料的要求,而导致生产效率下降,造成经济效益下降。三是因为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会破坏积累与消费的合理比例,还会使投资规模超过国力允许的范围,使一部分投资缺乏可靠的物质保证,造成一些工程项目的建设工期一再延长,在较长时期内占用大量的资金、劳动力和消耗大量的物质产品,而又不能向社会提供产品,必然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

第二、加工工业与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工业的比例失调和经济效益下降。在价格不合理和“财政包干”体制下,追求以产值为核心的高速度,必然导致加工工业与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工业的比例失调。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原材料、能源等价格偏低,相比之下加工工业价高利大,再加上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业等基础工业投资大,风险大、工期长,各地方政府和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发展加工工业,使加工工业发展过快,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工业不仅没有超前反而发展滞后,近几年我国轻工业和重工业中的制造业的发展速度高于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速度,而轻、重工业的发展速度高于能源(电力)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速度。这样,一是造成原材料、能源等供应紧张,使原材料、能源等价格上涨,企业成本上升。二是原材料能源供应紧张,造成原材料、能源货源供应不稳,企业为了保证原材料等的供应,必然增加流通中的交易费用。三是原材料能源等供应不足,常常导致开工不足和限电停产,使生产设备利用率下降,均衡生产受到破坏,各种生产费用猛增。四是造成加工工业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利息负担加重。五是因产品积压只好降价销售,导致销售收入下降,潜在亏损加重。六是在经济发展速度过高时,加工工业中一些技术水平低设备落后的企业纷纷加入生产行列,一方面由于其能耗物耗高,进一步扩大了原材料能源供应不足的缺口,另一方面由于其能耗物耗高,进一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七是在经济发展速度过高时,加工工业发展过快、原材料供应短缺,特别是某些优质原材料供应短缺,一些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自身利益,在生产中往往采取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方式来扩大生产,从而使产品质量急剧下降,造成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下降。八是原材料供应短缺,会引起企业对原材料的超量储备,使资金占用增加,经济效益下降。

第三、农业和工业的比例失调与经济效益下降。由于农产品的价值小,附加值低,而工业品的价值大,附加值高,因此,追求以产值为核心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使投资向工业倾斜,造成农业投入不足,出现农业与工业的比例失调。农业生产发展滞后对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一是农产品短缺使一部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因缺乏原料而处于设备闲置开工不足的状态。二是国家为了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就必须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而使企业原材料消耗成本上升和工资成本上升。三是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实行部分补贴削弱了国家的财力,相应地减少了对基础产业的投资,进一步妨碍加工工业的经济效益的提高。

(2) 关于经济体制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追求以产值为核心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在改革之前只有通过强制的行政指令才能得以暂时克服,但后来总是“旧病复发”,改革十多年来,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相反,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机制

强化的情况下，这种状况还在恶化。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现行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存在一种强有力的速度利益机制，驱使着地方政府和企业去通过粗放性经营，靠增加投入来获得经济利益。

第一、劳动力的不流动性迫使企业追求发展速度。现阶段存在的劳动力的企业所有制和部门所有制，使企业不能根据生产的发展状况调整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不能在企业、部门之间合理流动，企业对劳动力只有吸纳功能没有排泄机制，企业发展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可以从企业外部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但不适应生产发展需要的劳动力却只能滞留在企业内，为了减少矛盾，保证这些滞留在企业内的人的就业和企业人均收入水平不下降，企业就必然追求生产的外延性扩张，而不重视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二，企业行政等级制使企业加快发展速度能获取更大的利益。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根据其产值规模，职工人数分为不同的行政等级，相应隶属于不同等级的政府，在这种行政等级制下，企业加快发展速度能获得多方面的利益。一是企业产值越大职工人数越多，其行政等级就越高，就能受到更高一级政府在资金、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支持，在竞争中取得更有利的条件。二是企业行政等级越高，干部享受的福利待遇和政治待遇也就越高，干部和职工也就具有更好的政治发展前景和更多的晋升、业务提高的机会。因而，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一股追求发展速度而不注重效益的强大动力。

第三，企业承包制的不完善和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使企业缺乏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一是企业承包制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承包者的短期行为，产生这种行为的原因，即企业创新挖潜所带来的长远利益承包者不能分享，追加投资进行技术改造所带来的级差收益，随着承包期限的结束而转移到国家手中，使承包者只追求生产的外延性扩张所带来的即期利益。二是即使在同一承包者连续承包的条件下，承包者也会因承包基数上调这一“棘轮效应”，在企业内部挖潜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有所保留，把经济效益提高的幅度控制在实现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范围内。同时，由于现阶段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中，仍然存在不分劳动量的多少和质的好坏，平均主义的分配个人消费品的现象，极大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劳动者缺乏努力学习技术，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

第四，速度冲动制约松弛使企业追求发展速度缺乏应有的约束。在现阶段，企业软预算制约并没有得到克服，承包制也只是负盈不负亏，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与企业利益切实挂起钩来，企业追求发展速度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没有成为制约企业速度冲动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强有力的行政指令能对企业的速度冲动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外，任何建立在以企业经营后果切实影响企业利益基础之上的经济杠杆，都难以对企业的速度冲动起有效的约束作用，使企业在追求发展速度时几乎没有什么障碍。

第五，各级政府的行为对企业追求发展速度起着强化作用，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一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往往把下级干部在任职期间所在地区的产值发展速度作为考核和晋升干部的标准之一，而各级地方干部也把产值增长速度的提高作为自己任职期间有政绩的一种标志，从而与企业追求产值的增长相吻合。二是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地区的财政收入和减少本地区就业困难的压力，用行政手段对落后企业采取保护措施，为它们解除外地区企业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使企业速度冲动的制约条件更加松弛。三是在以上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必然导致长线产品的生产不能得到压缩，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得到调整，使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种失衡的低效益状态。四是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形成的条块分割，使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往往把本地区本部门所属的企业加入其他地区其他部门所属的企

业集团，看作是对自己“势力范围”的削弱，而处处作梗，使产业组织的合理化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无法获得，经济效益难以提高。五是由于我国经济是粗放性、“速度性”经济，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是靠增加投入靠产值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不仅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和就业困难加大的强大压力，而且也会给中央政府带来同样的压力，因此，为了保证财政收入能稳步增长和减少就业困难的压力，中央政府以及各部门对地方政府追求产值高速增长的行为，也常常采取认可和支持的态度。

其实，经济发展既可以通过提高经济效益来取得，也可以通过增加投入增加物质消耗来取得，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企业却选择了后者，关键在于：通过后者比通过前者更容易，获得的利益更大，这也就是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长期低下的最深层的原因。

三、提高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对策

要提高经济效益，应针对造成经济效益下降的不同层次的原因，采取不同的对策。

1、治标对策

所谓治标对策，就是根据造成经济效益下降的表层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

即：有计划地控制原材料燃料等价格上涨的幅度，根据企业的承受能力，分步骤地使原材料燃料的价格到位，使企业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力度，坚决对一些效益差的生产长线产品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并同时加快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工业的发展，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发展速度，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坚决制止滥收费、乱摊派、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体系，以便减少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活力；国家应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以增加企业发展的后劲；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企业的重大决策，都必须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同时通过必要的科学论证方可决定，克服决策的盲目性；严格企业管理，强化劳动纪律，维护企业管理的严肃性；加强对在职职工的技术培训和文化教育，确保劳动力技术素质的不断提高；采取得力措施，要进一步惩贪倡廉，要切实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以促进社会公平，等等。

2、治本对策

所谓治本对策，就是要实现从速度利益机制向效益利益机制的转换，通过形成一种新的利益机制，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各企业和劳动者去努力地提高经济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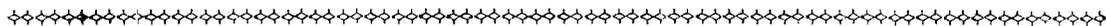
(1) 实现观念的转变。就是要使人们(特别是经济决策部门和决策者)的思想从以产值增长速度为中心，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转变。为实现从速度利益机制向效益利益机制的转换，创造必要的舆论环境。(2) 建立有限的劳务市场。所谓有限的劳务市场，就是同一地区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企业和职工，可以实行“双向选择”，劳动力可以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企业之间合理流动，实行富余劳动力与企业的分离。但劳动者享有在原企业优先重新就业的机会，从企业游离出来的劳动者的待业救济和其他社会福利由国家按职工人数和经营状况从企业中征收，并由地方劳动人事部门负责发放，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待遇不变。这样，就在原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下，实现了富余劳动力与企业的分离，从而消除了企业由于安置富余劳动力而只求发展速度而不考虑经济效益的现象。(3) 改革企业领导干部的政治、经济福利待遇制度。实行企业领导干部的政治、经济福利待遇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就可消除企业领导干部单纯追求产值增长速度的经济动因，建立起用经济利益诱导企业领导干部提高经济效益的机制。(4) 把经济效益指标纳入承包制。一是把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指标纳入

承包的内容,将承包者的利益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联系起来;二是对因技术进步而提高经济效益所带来的级差收入,应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给承包者,并合理确定基数,避免出现“鞭打快牛”,激发承包者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5)全面推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改革,建立反映劳动质和量的工资制度。通过将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同时,实行反映劳动的质和量的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使劳动者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关心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6)把经济效益指标纳入财政包干体制。通过把地区经济效益指标纳入财政包干体制,把经济效益的提高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利税递增分割比例的一个权数,将地方财政收入与本地区经济效益联系起来,使地方政府从本地区的利益的角度去关心经济效益的提高。(7)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开展清产核资,解决国有资产状况不清,管理混乱和被侵占流失的状况,确保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增殖。同时,实行“税后还贷”,硬化企业预算约束,改变企业速度扩张冲动制约条件松弛的状况。

如果建立起了地方政府、企业、企业职工和承包者的经济利益与经济效益的紧密联系,建立起了有效的效益利益机制,经济效益长期低下的顽症就能得到根治。

注释:

①详见刘光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第6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上接36页)

当然,如果没有历史资料可用,以上这两点就很难做到。然而中国有几十年比较丰富、全面的调查资料,这正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信息,所以我们提出的改进方法,对于相当一部分的抽样调查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

从我们的研究和探索中,虽然积累了一点经验,提出了看来是可行的改进方案,但也感到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在本项目的研究中,我们较多地应用了数理统计中的多元分析方法的某几种处理资料的技术,如聚类分析,多对多、多对一的回归分析,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然而还有大量的方法尚未引入多目标抽样调查的领域,还需作进一步的探索 and 开发。从实际工作的需要来看,就农产量调查本身,还有以下的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遇到有重灾或重大政策变化的年份,应怎样补充一些样本点,或怎样进行折算,……等给出一些补救的方法来保证估计的精度。

(2)怎样在一套样本点使用若干年的基础上,及时发现应予以调整才能保证精度?如何调整使人力、物力等花费较小?

(3)对于典型调查与随机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案,应如何评价它的好坏?怎样从理论上给出一般性的原则来指导这一类调查方案?

(4)如何将经济作物的调查,农家计的调查……等等,许多不同类型的多目标调查形成的一个特大的多目标调查选择抽样方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

从我们的工作来看,深深感到这一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可以研究,还有很多潜力可发掘,希望在这一方面能有更多更好的成果不断涌现出来。